



楚晖



楚 晖
第 三 辑

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875印张 165,000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0

统一书号：11106·154 定价：0.83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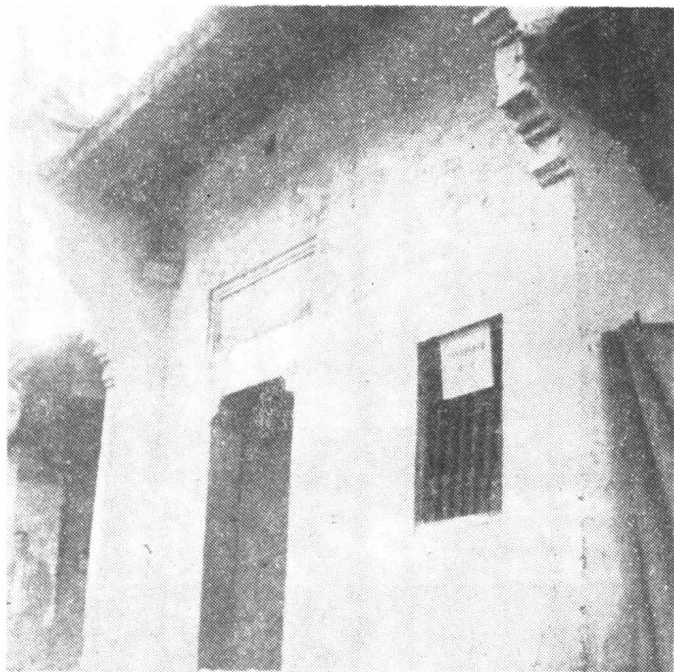
〔限 国 内 发 行〕

94079



▲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

红安县革命历史博物馆供稿



◀ 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旧址

洪湖县革命历史博物馆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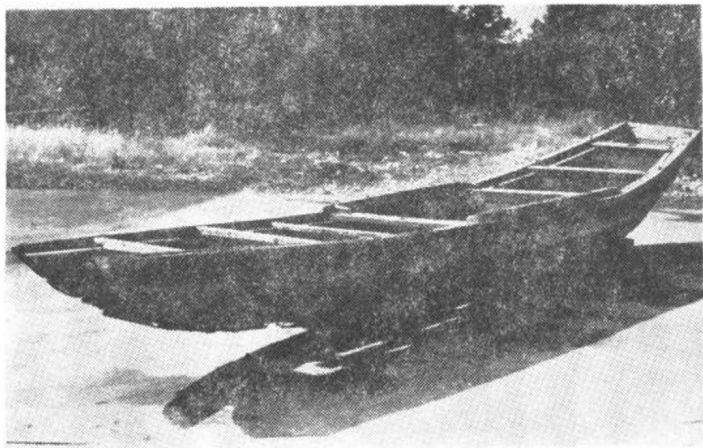
英雄的木船

刘
长
荪

湖北省博物馆珍藏了一只木船，它是我省江陵县的老船民王元礼捐献的。这只木船有着一段又一段的不寻常的经历。

船主人王元礼，早在一九二八年便参加了党的地下交通工作，驾着这只木船，往来于公安陡湖堤、江陵马家寨一带的江面上。一九三〇年七月，贺龙同志率领红四军自湘鄂边东下，与周逸群同志领导的红六军会师公安，并决定自陡湖堤过江到江陵大兴场。王元礼驾着这只船载着贺龙同志跨越浩荡的长江。一九三一年二月，这只木船装运过长江两岸的游击队——江右军和江左军；一九三二年八月，它又在敌军舰的阻击中，胜利地把活动在松滋一带的游击队载往江北；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支向新四军投诚的日伪军潘部，也是由这只木船装载过江的。解放战争时期，一九四九年七月，这只木船又参加了第四野战军解放沙市的运输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防止日本侵略军的破坏，王元礼常常把船沉在水底里。一次，日军又来了，王元礼来不及沉船，急中生智，把船翻扑在稀泥巴里，日军搬也搬不动，烧也烧不燃，没办法，举起刺刀砍，把船底砍坏了。现在的船已经过维修，船底板是新换上的。



目 录

楚 晖

丛书 第三辑

	(1) 驰骋襄南 威慑武汉.....	张执一
回	(21) 重返鄂豫边区.....	郑绍文
忆	(38) 在懋功会师的日子里.....	韩东山
录	(51) 回忆吴家新场的一次战斗.....	吴世安
	(59) 张国焘从延安到武汉叛逃的经过.....	张 海
	(66) 在井冈山斗争中的宛希先.....	王弟俊 桂遇秋等
人	(81) 一代哲人钱亦石.....	赖钦显 杨存厚
	(88) 张难先五顶蒋介石.....	周玉承
物	(97) 难忘啊，白求恩大夫.....	李盛财
	(105) 史沫特莱和她的“中国儿子”.....	郭令忻
湖北	(115) 狱中诗(一首).....	恽代英
烈士	(116) 龟蛇吟(一首).....	林育南
诗抄	(117) 黄河大堤远眺(一首).....	李求实
	(118) 寄孙问梅兼示中泥清仲堂(一首).....	肖楚女

史	(120)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湖北的党组织概况·····	屠仲琳 胡传章 张通宝
	(146) 湘鄂赣苏区简介	湛宗仁
	(169) 抗日战争初期	
料	周恩来同志在珞珈山的革命活动片断	
	·····	杨小岩 何天齐 黄庆璋
	(180) 彭总认真处理人民来信	桂遇秋
革命故事	(185) 几次幸福的会见	傅继忠
	(194) 罗厚福的故事片断	周志纯
轶闻轶事	(201) 部分党史人物名字的由来	甦 激
	(205) 一则“启事”	史求实
	(207) 王树声将军的一首爱情诗	兴 家
	(209) 蒋先云怒斥蒋介石	芯 辑
问题解答	(210) 为什么陈独秀当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书记?	
	(211) 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为什么能够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213) “毛泽东思想”是谁最早提出来的?	
	(215) 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没有第三方面军?	
革命旧址简介	(216) 血花世界	玉 麟
	(封二)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	
	(封二) 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旧址	
革命文物简介	(封三) 英雄的木船·····	刘长荪

驰骋襄南 威慑武汉

张执一

威震襄南敌伪顽，
轻装挺进汉江间。
不辜父老来苏望，
千里洪湖指日还。

《饮马长江》（作于 1943 年）

翻阅旧日积存诗稿，这几行文字蓦然映入我的眼帘，激起了我对抗日战争时期转战在中原地区的新四军第五师的一支游击健儿，挺进襄南重返洪湖的追忆。

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新四军五师的干部都是中青年。我们的负责人中，年青的在二十五岁左右，年纪大些的也只有三十岁左右。主要负责人李先念同志那时刚到三十岁，任质斌同志才二十五六岁，陈少敏同志稍大一点，也不过三十来岁。后来来到这个地区负责的郑位三同志，被我们尊称为“位老”，其实，当时只四十多一点。那是一段耐人怀念的年月，同志们生死与共，艰难同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整日里吵吵闹闹，说说笑笑，彼此有了意见进行争论，相互批评与帮助，甚至上下级间争吵得

编者注：文中所引诗句，均系张执一同志抗日时期诗作。

回 忆 录

面红耳赤以至对骂，说开了就完事，毫不记成见。上下级关系也不是那么严格，地位可以互换，一时某人成了上级，一时又成了下级，大家习以为常，不会因此带来不满。现在回想起那种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仍使人回味不已。

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使我最难忘记的就是进军襄南这段经历。我军一九四一年三打侏儒山，开辟川汉沔地区，从东翼楔入襄南；一九四三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又由西翼挥麾南进，恢复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洪湖根据地，使我江汉地区（包括襄南）与鄂中、鄂东、鄂南联成一片，互相策应，最后实现从四面八方战略包围武汉的壮举。

开辟襄南的全过程，是我们党在该地区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体现。

—

滔滔襄河，出秦岭，经鄂西北，至武汉与长江合流。襄南是指从沙洋到武汉之间，襄河以南，长江之北，包括江陵、潜江、沔阳、监利、汉阳等县和天门、京山（当时京山县一部分地方如聂家滩在襄河南岸）、汉川、荆门、石首等县局部，面积共万余平方公里。

襄南扼武汉西达四川的水陆通道，从汉阳有东荆河直通沙市，又有汉宜公路经沙市到宜昌。沟渠纵横，湖泊棋布，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这里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一九二七年，农民运动就在这一带蓬勃兴起；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湘鄂西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部分，“太阳出来满天红，扛起梭镖跟贺龙。贺龙跟着共产党，共产党有个毛泽东。”这战斗的歌声曾经响彻江河两岸。一九三二年秋天，工农红军实

行战略转移离开这里以后，国民党反动军队随带一些恶霸地主武装还乡团卷土重来，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日本侵略军又侵占襄南各县县城，将其魔爪伸向川（汉川）汉（汉阳）沔（沔阳）地区。“犹记当年革命歌，有谁无愤控顽倭。滔滔夏汛襄江浪，难比人民血泪多。北山长望欲飞魂，久久难干血泪痕。风雪寒宵闻犬吠，犹疑战士夜回村。”（作于1943年）在国民党和敌伪残酷蹂躏下的襄南人民，何等深切地怀念着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啊！

早在日寇侵占武汉之初，襄南地下党就曾领导当地革命人民，建立了几支小型武装，后编入我新四军鄂中部队。在新四军鄂豫边区部队创建初期，我们遵照当时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关于“新四军刚到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的指示，就由东翼数度进入襄南，在武汉近郊的汉阳县境燃起抗日游击战争烽火。

一九三九年八月，新四军鄂中独立游击支队成立不久，第四团团长李人林和政委雍文涛同志等曾率第四团经沔汉湖飞渡襄南，与汉阳县党的地方老党员肖利三肖文安父子所创建的地方武装五中队并肩战斗，击溃了盘踞高庙的伪和平救国军九十二师熊光部队。

一九四〇年二月，新四军鄂豫边区部队已扩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纵队首长李先念、陶铸等同志曾亲自率领第五团（团长蔡松荣，现改名蔡斯烈，政委杨焕民）二渡襄河，李人林、周志刚同志率第四团在襄河边策应，打击侏儒山一带的伪和平救国军八十二师汪步青部队。我军在攻占侏儒山集镇街道击毙伪军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俘二十余人后胜利北返。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美国革命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曾随军采访写过报道，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中国的战歌》中，她以《挺进纵队和矿工》为题，记述了五团的成长。

回 忆 录

同年八月，豫鄂边区党委和纵队首长派我持董必武同志给当时在汉阳一带掌握一千多伪军的杨经曲的电报，到汉阳蔡甸附近官塘角一带，在当地地方党负责人顾大椿、易家驹等同志配合下，我们争取到杨经曲、黄人杰等率伪八十二师下属的一六五旅一千五百余名官兵反正。这支起义部队序列名十团、十一团，与我豫鄂挺进纵队第四团合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四支队，下设三个团，自杨瀛率部叛变后，又加上吴林焕同志为团长的九团，杨经曲为支队司令，王海山同志为副司令兼参谋长，郑绍文同志为政委，我为政治部主任。郑绍文同志不久调走，我则继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接二连三的胜利，打击了敌伪，鼓舞了襄南人民，然而，由于那时我们的重点是发展路东（即平汉路以东的鄂东地区），所以主力部队一直未能向襄南纵深发展。

二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四支队改为五师第一纵队，杨经曲任司令，因王海山同志调任五师十五旅旅长，副司令兼参谋长则由张文津同志充任，我仍任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过了一段时期，第一纵队同十五旅合编，取消了第一纵队番号，杨经曲改任十五旅旅长，原旅长王海山同志改任副旅长，张文津同志任参谋长，我改任政治部主任，杜邦宪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我同时受鄂豫边区党委委托，负责指导十五旅活动地区的襄西地委、天汉地委，及其所属京（京山）钟（钟祥）、天（门）京（山）潜（江）、京北（京山北部）等县委的工作，因而对该地区地方工作得以与闻。

一九四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执行“以战

养战”的反动方针，加紧搜掠战争资源，巩固其在华占领区，突向我全国各解放区发动进攻。敌华中派遣军派其主力第三师团和第四师团一部，配合伪军向我鄂豫边区各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与之密切配合向我进攻挑衅。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为牵制敌人兵力，粉碎敌伪顽夹击，扩大我军回旋区，新四军五师首长和十五旅党委决定：由我率四十四团的三个连和一个手枪队，远涉襄河，直插武汉近郊汉阳，为我军向襄南的川汉沔地区发展作准备。我们在汉川、汉阳地区活动不久，即将川（汉川）阳（汉阳）工委的地方武装改编为天汉游击支队。这支部队的纪律虽不甚好，但对地方情况熟悉，对我军帮助很大。一九四一年九月下旬，我率这支小分队回到故乡汉阳之索河和蔡甸附近之官塘角（当时蔡甸镇虽是日寇据点，但周围乡村均是我活动区）、长新集、蓼山一带，一面扩大活动地区，开辟财源，一面对伪军开展政治攻势。根据师首长指示，我们第一步争取他们不坚决与我为敌，第二步争取他们反正，接受我军整编。

当时，盘踞汉阳的伪军仍是汪步青部。原来，汪步青自从一九四〇年遭受我军打击后，在日寇卵翼下，又有较大扩充，自认为羽翼已丰，换上了伪定国军第一师的招牌，拥有三个团、一个机枪营和一个教导大队共五千余兵力，还有兵工厂自制步枪和机枪。汪步青任伪定国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盘踞在沔阳的彭家场、西流河、双河口、下汉埠（现均属洪湖县境）、汉川的南河渡以及汉阳的邹家帮、侏儒山、桐山头、永安堡、三羊头、东江脑、水洪口、曲口、窑头沟、消洒沟、九沟一带，横征暴敛，鱼肉人民。我到汉阳不久，就通过当地士绅带信，向他交代我党政策，敦促其反正，但汪步青不仅不听劝告，反而扬言：“我有万人之众，新四军其奈我何！”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怙恶不悛的家伙，必须给予坚决打击。

三

“消泗九沟扬义杆，红旗敢插侏儒山。”（作于1943年）正象整个襄南地区一样，汉阳人民是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土地革命时期，当地农民运动领袖沈万川、高明山、高士俊、高士全（以后改名高纯一、高树颐）等同志领导消泗沟和九沟一带的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参加工农红军，后来在西征途中虽相继壮烈牺牲，然而烈士们前仆后继的英勇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故乡人民的革命斗志。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汉阳人民又派遣他们的英雄儿女，北渡襄河，参加到新四军第五师的战斗行列。人心向我，使我们的工作进展很快。我们依靠地下党和人民群众，并争取到当地开明士绅的帮助，不久就弄清敌伪情况，并展开了政治攻势。

为了扩大我军政治影响，我们一到襄南，即各以一个连的兵力，同时夜袭距武汉市只有三十公里的蔡甸、黄陵矶、大集场等三个日军据点，拂晓撤离。这次军事行动对敌伪震动很大。有不少伪军或伪方人员，慑于我军声威，纷纷向我接洽，说明他们决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我们也晓以大义，争取他们。

盘踞川汉沔地区的日寇不多，主要是伪军，其中势力最大者是汪步青的伪定国军第一师，此外还有伪定国军第二师李太平部一千余人，驻在沙湖、平场和沔阳县城；伪定国军军长刘国钧率教导团几百人驻沙湖；其余小股伪军均依附日寇分驻在汉川系马口和汉阳蔡甸、黄陵矶、大集场等据点。

伪军内部分崩离析，互相倾轧。汪步青既已投降日寇，又与国民党特务暗中勾结。伪副师长黄潮和参谋处长徐某均系国民党特务，因此，日寇对他并不信任，敌伪之间互相猜忌。汪步青打着曲线救国的招牌，一面向敌据点方向修筑工事防日本鬼子，一面

又经常向日寇宣抚班、宪兵队送礼行贿，实际上他们是脚踏两只船。此外，他为争夺地盘横征暴敛，与刘国钧、李太平的隔阂也很深。在伪定国军第一师内部，各地方势力和帮派之间也矛盾重重。

川汉沔地区河网交织，不适宜大兵团作战，针对这一地理条件和伪军特点，我们决定以政治瓦解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完成歼灭伪定国军第一师的任务。遵循这一斗争策略，我们派出干部和基本群众，通过伪军亲友及青红帮等各种渠道，逐渐渗透到伪一师内部，利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伪一师是汪步青利用家族和帮派关系拉起来的。他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在国民党部队当过下级军官，后回乡当了帮派头子，结交弟兄很多。武汉沦陷以后，他利用帮派家族关系拉起部队，不久即投靠敌寇，整编为伪军。伪一师的士兵多是被汪步青骗来的（一九四〇年元月中旬，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访问我们俘虏的二十几名汪步青部伪军后曾经这样报道：“被俘的伪军目光忧郁，面色惨淡，声称他们是被迫加入伪军的。有个伪军说，汉口沦陷后日本人到了黄陂，把他们那个村子烧成平地，他听说要招收苦力修铁路，就同五个年青人一起报名，结果被带到侏儒山汪步青这里当了伪军。”可见伪军中很多人并非甘心事敌）。汪步青重用的亲信多是其家乡人，这些人的家属在汉阳侏儒山、永安堡一带挨家挨户住着，向每个村子派粮派款，甚至烧的柴草也向老百姓摊派，广大群众非常不满。我们就从这里入手，激发群众对伪军的仇恨。我们对群众说：“汪步青这些沔阳的地主流氓地痞跑到汉阳来帮助日本鬼子搜刮你们，压迫你们，吃你们的粮，烧你们的柴，使你们生活更加困难，你们只有支持新四军抗日才能得到翻身。”

汪步青的兵工厂，多是汉阳人，经常受当官的沔阳地痞流氓分子欺压，我们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起来反对那些沔阳当官的，反正过来，才能得到解放。”对汪步青部队的沔阳人，我们宣传的

内容又有所不同。他们说：“我们是持曲线救国才当伪军的。”我们说：“当伪军就是替日本人卖命杀自己的同胞，哪有什么曲线救国的事？要救国就得脱离伪军，沔阳洪潮是当年的革命老根据地，是有光荣传统的，你们不要把老根据地的名声搞坏了！你们应该反正过来，和我们共同抗日。”经过这样分化瓦解，伪一师内部人心涣散，纷纷动摇，有的弃暗投明，向我军提供情报。我们不仅掌握了伪一师的总兵力和各据点兵力部署，甚至对排以上的伪军官姓名、经历及社会关系，也都了如指掌，把伪军一段时期的口令也弄到手了。

在政治瓦解工作奏效以后，我们立即报请新四军第五师师部批准，十五旅由王海山、周志刚、张文津等同志率所属四十三团全部和四十四团的另二个营（当时的四十五团在襄西、襄北一带分散坚持，无法抽出）夜渡襄河赶来增援，与在襄南活动的四十四团另一个营以及天汉游击支队一起，向伪定国军第一师发起军事进攻。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十五旅四十四团和天汉游击支队各以二连兵力，分两路进袭侏儒山和南河渡，带路的就是从伪一师反正过来的原伪军三位班长（原来，在我军进攻之前，这三位班长曾分别对他们的部下说：“如果有战斗，不管上面什么命令，你们听我的，我叫打就打，不叫打就不打。”不料这件事被汪逆发觉，于是他们结伴到了我们这里）。恰在这时，我们从一位派赴汪部作争取工作的地方旧知识分子手中拿回伪一师的十天口令（是汪部参谋处主任参谋提供的），因而我们更增强了以极少兵力夺取胜利的信心。

这次战斗，我军利用伪军口令，顺利通过敌人三道岗哨，一枪未发，即将伪三团团部及特务连、卫士班歼灭，俘伪团部军需主任以下官兵百余人，缴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三挺，步枪百余支。第二天早上，当日军分三路进攻时，我安全转移。

十二月七日，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的那天，我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全部和天汉游击支队一个大队，分两路向侏儒山、南河渡、桐山头作第二次进攻，第二天清晨调整部署，经激战后，四十四团攻占将军岭和桐山头，俘一连伪军，歼伪机枪营和步兵一百余人；四十三团以一连兵力进攻裴家山，击溃伪军新兵连。后因黄陵矶和大集场日寇在蓼山会合向我出扰，攻我侧翼，企图截断我四十三团一营归路，于是我军主动撤出战斗。四十三团团长沙文同志（广西人，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为掩护我的安全，让一条渡船载我渡过索子长河，而他自己则不幸牺牲。现在在一念及，心里都十分难过，我将永远对这位英雄战友表示深切的悼念。

十二月二十三日，十五旅集中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和天汉游击支队全部，第三次分三路向侏儒山、周家帮进逼。此时伪军由于不断遭受我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士气十分低落，不堪一击。有的伪军公开喊道：“汪家给了我们什么好处，何必替他卖命！”我一举即攻占侏儒山，伪军溃退。驻周家帮之伪司令部在我强攻之下，溃不成军，向汪家场、余家场一线撤退，我军追击时歼敌一营。我军攻进侏儒山以后，群众高兴极了，主动帮助我们抬运、抢救伤员，还抬着整猪整羊，挑着鲜鱼来慰问我们的部队，至今回想起来，那热烈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眼看伪一师行将覆灭，沙湖伪定国军军长刘国钧及伪二师李太平部千余人，配合驻沙湖日寇，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向西流河我四十三团阵地进犯。我军隐蔽于河堤下，当敌伪进至距我阵地二百米时，我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并与日寇肉搏，将其全部击毙，俘伪军四百余人。被俘者除自愿留下抗日者外，其余都发给路费释放。获释伪军到处宣传我军政策，规劝同伙放下武器。以后伪军每遇我军，有的举手投降，有的不战即溃，甚至伪兵工厂厂长

回 忆 录

被俘后也主动承认自己身份，将汪步青命令埋藏的造枪设备，其中有十余部精密机床，以及步枪和机枪枪身都交了出来。

“三战侏儒敌胆寒。”（作于1941年）全歼汪步青伪定国军第一师之战，开始由十五旅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和天汉游击支队参加。以后商请正在襄河北岸活动的十三旅旅长周志坚同志和政委方正平同志亲率该旅一部渡河来增援。我们组成了临时指挥机关，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进攻，才基本上结束这一战役。在消灭汪伪部队的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中，我军在彭家场附近的胡家台发现由沙湖出扰之日寇数百人，与之激战终日，双方伤亡达三百人以上。

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我军共作战十四次（对伪军和日寇各七次），除全歼伪定国军第一师外，还击溃伪定国军第二师千余人，击溃日寇七次增援，毙伤日寇二百余人，俘伪军九百五十余人，缴获了兵工厂全部设备和大批军用物资。最后，汪步青本人也被我生擒。

“襄南捷报似花飞。”（作于1941年）至此，在襄南东部，如汉阳之侏儒山、桐山头、永安堡、消泗沟、九沟、水洪口、曲口、窑头沟、三羊头、东江脑，沔阳之西流河、周家帮、何家帮及汉川之南河渡、西江亭等大片国土，基本上为我控制。我们不仅粉碎了敌伪对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还扩大了根据地。在侏儒山战斗期间，我手枪队员几度潜入武汉市区，广泛散发传单，扩大了这次战果的政治影响，使武汉敌伪一夕数惊，不时被迫戒严。此后，我小型武装经常出没于武汉近郊的姑嫂树、舵落口、郭茨口、十里铺等地，武汉商人为我军转运物资时，甚至公开向敌特声明：“这是四老板（指新四军）的！”敌特慑于我军声威，怕受到惩罚，只好放行。

一九四二年夏季，川汉沔地区抗日军民在对敌伪作战的凯歌声中欢度端午节。两千余人汇集在襄河岸边，舞起龙灯，踩着高

晓，人如海，歌如潮：

龙灯头上青，
我们欢迎新四军。
龙灯头上黄，
我们恨的是东洋。
团结有力量，
军民合力打豺狼！

.....

全歼伪定国军第一师之战所以能取得重大胜利，不仅因为我们选择了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在华兵力减弱的时机，还因为我们深入敌后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特别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的政策，紧紧依靠地下党和人民群众，军事进攻之前，我们对敌伪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先取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造成伪军内部分裂，丧失战斗力，然后辅以军事进攻，加上战术机动灵活，因此我军每战必胜，并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大的胜利。因这一胜利威胁到日寇控制的重镇——武汉。日寇乃抽调重兵，并随带伪军数千人对我侏儒山进行围剿。我军遵师部命令，主力撤离襄南东翼，集结到白兆山一带应付顽军的进攻，只留范敏夫同志率少量兵力以天汉游击支队名义，坚持游击战争。

侏儒山之战是胜利开辟襄南的开端，而扭转襄南全局的战斗是在以后进行的。

四

在我军进入川汉沔期间，直至一九四二年末，襄南西翼及中部的江陵、监利、潜江、沔阳、汉川等县除县城为日寇侵占外，